

符号学视角下传媒教育的六个向度

刘利刚¹ 李静²

(1.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国际传播学院, 重庆 400031)

(2.重庆大学艾柯研究所, 重庆 400031)

摘要:从符号学视角看,教育是对受教育者符号化的过程。传媒教育包括新闻学与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专业教育。文章以雅柯布森符号指过程六因素理论为依据,剥开传媒教育的表象,从刺点意义上精准把脉传媒教育过程的六个向度,能够更加清楚地讨论传媒教育中的诸多问题,是优化传媒教育过程的关键。分析传媒教育过程六个向度及其反馈关联过程,有助于认识、推进及创新传媒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传媒教育;培养模式;符号学;符号化;展面;刺点;向度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23)04-0119-10

DOI:10.13743/j.cnki.issn.1009-8135.2023.04.006

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教育是由“符号型塑我们的信念体系”^[1]的过程,即教育是对受教育者符号化(semiosis)的过程。当今的传媒教育概莫能外。传媒教育是一个外延相当广泛的“集体名词”,具体指新闻学与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专业教育,这些学科与各类“媒介”须臾不离。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纵横谈》中讨论摄影时,用了一对拉丁词“Studium”和“Punctum”^{[2]39}。赵毅衡建议将其译为“展面”和“刺点”^{[3]168}。虽然这对概念意蕴丰富,存在不同解释,但撮要而言,展面主要强调正常化、均质化,而刺点与之相反,是一种“正常化”的断裂,强调一种独特的新奇体验,非普遍而普通的体验。笔者用巴特刺点理论的意义在于,打破传媒教育过程及对其讨论的正常化、均质化。笼统地讨论传媒教育问题是一种展面意义上的讨论,而从六个向度对传媒教育符号化过程展开的“元符号学”^[4]分析,则是一种刺点意义上的讨论。对这六个向度刺点意义上的考察能够促发传媒教育领域内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符号化意识,而这种符号化意识的自觉有助于推进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简介:刘利刚(1976—),男,甘肃天水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传播符号学与叙述学。李静(1975—),女,河南洛阳人,重庆大学艾柯研究所所长,博士,特聘教授,主要研究符号学理论。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体认+’时代传媒人才培养的混合学习模式实践研究”(JY22962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电影红色文化的符号学研究”(21BXW093)。

一、“六个向度”之源：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

传媒教育过程的六个向度之说，源自于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著名的符指过程六因素理论。雅柯布森说，他的这个模式是由卡尔·毕勒（Karl Buehler）的“工具论模式”（Organon-Model）发展而来的^[5]。由于雅柯布森所用的某些术语，与符号学后来发展出来的一套术语很不相同，容易引起误会，所以赵毅衡在《符号学》中对雅柯布森所用的术语进行了改造，但出于对雅柯布森的尊重，在如图1所示的模式中，括号外用《符号学》一书现用的术语，而括号内用雅柯布森原先用的英文词。经过改造的模式如图1所示^[6]。由于笔者主要用这个模式探究传媒教育中的六个向度，所以在赵毅衡改造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动。笔者将“发送者”改为“施教者”，将“接收者”改为“受教者”，括号里的英文术语继续使用雅柯布森原先用的英文术语，因为对于教育过程而言，施教者即发送者，受教者即接收者。其他四个向度没有做进一步的改动，因为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教育过程也即符指过程，均涉及对象、文本、媒介和符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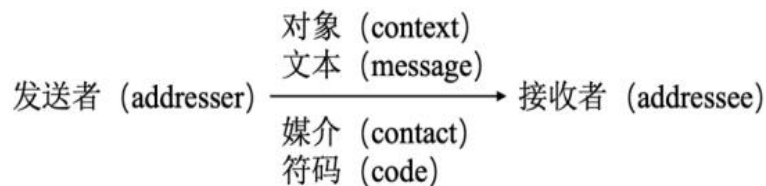


图1 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

雅柯布森认为，一个符号文本同时包含六个因素，符号文本不是中性的、平衡的，当文本让其中的一个因素成为主导时，会导向某种相应的特殊意义解释^{[3]179}。而这种非“中性”的、特殊的导向性解释，恰巧具有“刺点”意味。实际上，雅柯布森的符号六因素模式，完全可以溢出“文本”，进入更为广义的“符号文本”范畴，将符号文本所在的整个“符号域”^[7]囊括在内。正因如此，按照从“文本”到“符号文本”的延展路径，传媒教育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动态文本”抑或“活态文本”，顺其自然，符号文本六因素也就可以转换为传媒教育过程的“六个向度”。具体请参见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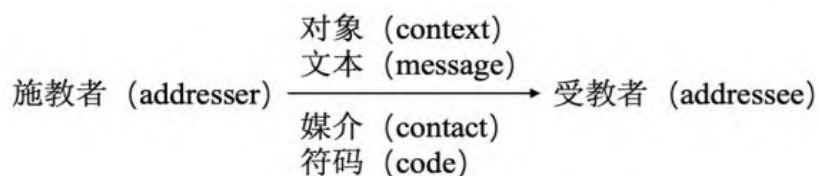


图2 传媒教育过程六向度

这里需要详细解释的是，笔者为什么要在图2中使用“向度”这一概念，而没有使用原先的“因素”这一概念？因为“因素”是一个静态的描述性概念，“向

度”既包含“因素”这层意思，还具有偏向、突出等以言行事的语力。这六个向度之间并非相互独立，毫无关系，而是处于一种交织化状态。交织化状态指当某一向度凸显出来时，其他向度并没有因此而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它们皆有所作为。由于这六个向度整体构成了符号化过程，所以缺失其中任何一个向度，都难以完成对传媒教育的整体性“元符号学”观照。

雅柯布森所指过程六因素可以用来分析传媒教育过程，或其他教育过程。这种发展了的创新型传媒人才培养模式有助于打破过于依赖技术的“技术决定论”模式，让教育回归到自身的原点。而之所以有如此之功效，盖因这六个向度都围绕如何促进人的发展而展开，皆以人为本。

二、“情绪性”与“意动性”：施教者与受教者向度

在传媒教育的整个过程中，作为施教者的教师和作为受教者的学生，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向度。在如图1所示的雅柯布森所指过程六因素中，当表意过程侧重于发送者时，符号文本会出现较强的“情绪性”（emotive）。例如，符号文本中的感叹词等。雅柯布森认为“情绪性”不一定仅靠文本中的感叹词，实际上在符号文本的各个层次上，如语言、语法、词汇上都会表现出情绪功能^{[3]179}。从符号学的符号文本观来看，只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就是符号文本：“1.一些符号被组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2.此符号组合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合一的时间和意义向度。”^{[3]50}考察传媒教育实践过程不难发现，传媒教育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正在发生或生成的符号文本。在传媒教育过程中，能够观察到一系列符号被组织起来，也观察到这一过程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犹如甘肃陇南白马藏族的“池哥昼”^[8]仪式一般，是一种“活态文本”，所以传媒教育过程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正在发生或生成的符号文本。

更进一步说，传媒教育过程亦是一个叙述文本。赵毅衡认为叙述文本包括两个要素：“1.某个主体把有人物参与的事件组织进一个符号文本中；2.此文本可以被接收者理解为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9]进一步考察传媒教育过程，课堂教学中卷入了人物（施教者、受教者等），同时受教者即学生也能够从课堂中体认到时间和意义向度。因此，传媒教育的过程就是一场叙述过程，往往表现为一个叙述文本。这亦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教育领域叙述探究成为热点。事实上，在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等，都将叙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这里，以视听语言课为例做进一步阐述。分析许鞍华导演的《黄金时代》（2014）时，整个课堂首先应侧重于施教者即教师，教师可以通过语气、音色、姿势、表情、动作等吸引受教者即学生的注意力，这些相对于教师所讲的内容来说，只是伴随文本，但这些伴随文本对学生而言具有非常强的“意动性”（conative），它

们能够促使学生作出某种反应。如果教师除了使用以上伴随文本外，以命令、呼唤句、祈使句方式“以言言事”，将更能使学生集中注意力。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施教者与受教者联动，在课堂这一“活态文本”中，文本身份或符号身份是可以变动的。即是说，教师既可作为施教者，又可作为受教者，学生的身份也可作相应变换。具体来说，在开始对影片《黄金时代》做拉片之前，教师应该以疑问语气向学生发问，如该片中共计出现了多少个剧中人物直接面对观众讲话的镜头？在我们以往的观看经验中，这种剧中人物直接面对观众讲述的情况是相对阙如的。在实际拍摄中，演员是不能有意地盯着摄影机镜头的。电影是一个虚构世界，它与实在世界之间隔着屏幕。许鞍华导演别出心裁的做法极具标出性。而教师可以将这种标出性作为向学生发问的基础，结合语气、音色、姿势、表情、动作等情绪性表达，以疑问句发问，并辅之以祈使句等意动性较强的话语引导，促使学生作出某种反应。反过来，学生也可借由前述相同做法，引起教师的注意，使教师作出相关回应。

当教师与学生互动频繁、情绪性与意动性良性互调互增时，教学效果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提升。在智媒“必行”的当下，施教者与受教者这两个向度显得尤为重要，施教者在训练受教者批判性的反思精神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就目前非常火的人工智能 ChatGPT 而言，在技术路径上，它通过前所未有的大语言模型训练和对人类反馈方式的学习，具备了生成对话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人的“超级模拟”。但不难发现，ChatGPT 也离不开人类文化对它的“投喂”，它的背后是具有反思精神的主体，而施教者与受教者应该就是这样的主体。

三、“指称性”与“诗性”：对象与文本向度

在传媒教育过程中，对象与文本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向度，它们总体上可划归为教学的内容层面。在如图 1 所示的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中，当表意过程侧重于对象时，符号就会出现较强的“指称性”（referential），而当表意过程侧重于文本本身时，就会出现“诗性”（poeticalness）。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文本”与前文所讨论的“符号文本”和“叙述文本”中的“文本”不同，前文所述文本更多是从广义上而言的，而这里的文本主要指称内容层面。仔细分析雅柯布森的对象、文本两因素表意偏向理论，不难发现它们在传媒教育过程中也有所体现。在传媒教育过程中，教师要给学生讲授相关内容，这些内容是教师备课时选择的结果。以新闻摄影教学为例，新闻摄影教学的内容偏向于“对象”，必须遵循“所指优先”^{[10]17-21}，意义必须明确，指向外延，且不可仅偏向于“文本”，追求“能指优先”^{[10]17-21}，只具有“诗性”。对新闻摄影而言，所拍照片不可以仅指向自身，而缺乏真实的外延。否则，就是弄虚作假。

诚然，语言如“钉”能够精准定位，图像如“锤”能够楔入记忆深处^{[11]190}。也许正因如此，新闻照片造假风波，不仅屡见不鲜，而且还让人们记忆犹新。其中，有关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分析已非常丰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从纪实型与虚构型的“双区隔”理论对新闻摄影造假风波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目前还相对阙如。笔者研究了新闻摄影教学的大量文献，结合自身的新闻摄影教学实践，发现新闻摄影教学特别重视实践性，这值得肯定，但是不能够忽视理论教学，而且现有教材中关于新闻摄影的理论没有切中新闻摄影的肯綮，“双区隔”理论有助于弥补这些不足。

分析大量假新闻照片，追溯它们“假”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新闻摄影理论对于新闻照片之真假的辨别是失语的，即从理论上还没有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划分清楚。在当今视觉文化盛行的时代，符号极大丰富，如何让自己的照片博得眼球，在众多照片中“凸显”出来，给新闻摄影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在新闻摄影教学上没有讲清楚如何对新闻照片进行“图像修辞”，可能会导致走上记者工作岗位的毕业生，为了个人业绩，在不经意间或有意地进行“图像历险”，从而制造出“假照片”。毋庸置疑，一幅新闻照片之所以吸引人，缘于它是一幅有故事的照片，由于其中的故事是被叙述出来的，所以新闻摄影也就成了符号叙述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在图2传媒教育过程六向度中，“对象”可以对应于“一度区隔”的“纪实型”叙述，“文本”可以对应于“二度区隔”的“虚构型”叙述。这里的“一度区隔”与“二度区隔”就是所谓的“双区隔”理论^[12]。它可以阐释“真实”在什么意义上是“真实的”，“虚构”在什么意义上也是“真实的”，这两种“真实”对二次叙述化来说的确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的基础语义域都扎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中。倘若作为一名摄影记者对此理解不透彻，则很容易弄“假”成“真”。这正是新闻照片真假之辨的肯綮。新闻摄影不仅在“一度区隔”中要真实，在“二度区隔”中也要真实，除非是在新闻题材的电影中，那另当别论。在“一度区隔”中，由于主要是再现性的媒介及其可能操作，所以它是透明的，也往往被忽略，但恰因如此，它也成了造假的滥觞之地，由它所制造出的“二度区隔”即内容表现层面，很难看出真假。

人们常说的“P图”（所谓“P图”是指对图片做美化、变更、修复、拼接等操作），就属于一度再现区隔范围内的生产意义的活动。新闻照片的意义即“二度区隔”中的意义，理当来自“田野”中，即真实的事件中。这里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对象”，“新闻照片”是“再现体”，“真实事件”是“对象”，“各种报道”是“解释项”。在此三者之中，新闻照片和各种报道属于符号文本，而这些符号文本扎根的“基础语义域”就是真实世界，它们所指称的“对象”就是真实事件。一度区隔中的“P图”是否不失变形地凸显二度区隔中的“对象”则

是关键。如果“P图”操作使得展示在二度区隔中的“再现体”无法在田野（实在世界）中找到“对象”，那就是作假。反过来，倘若“P图”操作使得二度区隔中的“再现体”能够在田野中找到“对象”，那就是再现“真实”。

因此，仅就新闻摄影而言，对象偏向还是文本偏向，对于新闻照片是真是假的生产与判断非常关键。对象偏向，符号出现“指称性”；文本偏向，符号出现“诗性”。新闻照片，既真实又美观，何其美哉！但需要注意的是，要找准对象偏向与文本偏向的平衡点，无论过分偏向于谁，都会过犹不及。在传媒教育过程中，将对象与文本这两个向度延展开来，亦可解读出丰富的意义，除了前已述及的课程内容与课程内容的展示形式之外，当把施教者也纳入教育过程这个“活态文本”考察时，施教者所讲内容及其讲授方式，也应当做好平衡处理。如果能够追求“指称性”（讲授内容的正确性与真实性）之同时，还能够伴有因风趣幽默而产生的“诗性”，那何乐而不为呢！

四、“交际性”与“元语言倾向”：媒介与符码向度

媒介与符码是传媒教育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向度。虽然现在数字媒介时代，但是媒介对于人类而言，却是一种熟悉的“陌生存在”。或者说，虽然人们天天在使用它们，却并不熟悉它们。温贝托·艾柯认为符号表意必然是“异物质的”（heteromaterial）^[13]。艾柯的意思是，当符号表意有时空距离时，需要“异物质的……”，而在“异物质的……”这一偏正短语中，修饰语“异物质的”所要修饰的中心语正是“媒介”一词。可以体认的是，进行自我传播时，作为异物质的媒介就可以不需要了，或者说，越向过去追溯，人类对于媒介的依赖似乎就越低，从过去越往前看，人类对于媒介的依赖就越高。当下，人类正处于一个由媒介所架构的世界中。

正因媒介在当下社会相当重要，所以也就有了新闻学与传播学、戏剧与影视学等传媒类专业专门研究媒介。在传媒教育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课程就是在教授学生如何操控媒介做跨时空且高效的意义或信息传播。每当谈及意义、信息时，本以为人类的眼睛、耳朵或其他感官捕获了它们，但实际上通过感官所捕获的只是承载意义、信息的符号而已，抑或说，人类的感官所捕获的仅是承载意义、信息的符号的可感知部分。而关于意义、信息本身，人类是无法直接感知的，因为它们存在于索绪尔所说的“所指”中，是当下不在场的，只有通过在场符号的刺激，才能引发大脑的表意活动，即对意义、信息的捕捉活动，可能只有捕捉者本人的“语象肉身”^{[11]181-192}，即大脑表意活动才能与“所指”所指称的意义、信息直接相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所能感知到的只是符号（像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而已。

符号虽然可以被感知，但它们还是一种凌空的存在形式，需要各类承载物，而这些承载物就是媒介。在图1雅柯布森符号过程六因素中，当符号表意侧重于媒介时，符号出现较强的“交际性”（phatic）。之所以符号表现出交际性，是为了使发送者与接收者保持交流的畅通，或者说保持接触。例如，打电话时常说的“喂喂，你听得见吗？”就是为保持交流畅通进而保持更好地接触的例子。虽然现在媒介非常发达，但人们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依然是面对面交流。从文字表情包到视频通话甚或更先进的通信方式，都在试图还原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情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媒介的本质特征就是让处于异地的人们能够保持更好的接触，“接触”也即“连接”，它是“社会与媒介的本质”^[14]。

在图2所示的传媒教育过程中，媒介的本质作用就是使施教者与受教者保持接触。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攻坚时期，教育之所以能正常运作，关键是如腾讯会议、雨课堂、钉钉等媒介让教师与学生能共处“同一教室”保持良好的接触。正因媒介保证了交流的通畅，所以才有图1中符号表意侧重于符码，出现了较强的“元语言倾向”（metalingual）。这种情况，在图2中就是施教者向受教者解释前文所讨论的“对象”与“文本”，这种解释过程即上课时教师向学生的讲解过程，也是学生向教师求教与反馈的过程。上课时，面对重点、难点，老师既要借助媒介让学生保持注意力集中，又要变着法地给学生解释，以使学生能够理解，使学生能够依照符码理论对“对象”与“文本”进行解码。前文论述新闻摄影教学时，所论述的“区隔理论”，就是一种符码理论。

作为媒介的摄影术非常重要，但是新闻摄影教学理当凸显符码的重要性，因为就新闻摄影教学而言，符码理论能够分清“真照片”与“假照片”的边界。当前，随着人工智能走进人们的生活及工作等诸多领域，对于媒介与符码的认知必须升维，人工智能本身就是“AI媒介”（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dia），人类在使用它们，它们也在使用它们自身，之所以它们能够自己使用自己，在于AI媒介具有自我制造与更新符码的能力。当然，元符码仍然是由人类所撰写的。不过，未来已来，传媒教育必须学会与AI媒介协同工作。

在当今这个智媒时代，媒介与符码是传媒教育中的两个关键向度，传媒教育之兴衰，与媒介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传媒教育中必须注重对媒介的利用与研究，媒介带来的交流畅通，为教师传道授业、为学生反馈疑惑带来了便利，但同时也要培养学生驾驭媒介的能力，过分依赖或贪婪媒介，会适得其反，让自己丧失“元语言”层级的编码或解码各类符码的能力。媒介的本质是“连接”，使授业解惑过程变得通畅，但不能将“连接”当作学习本身。ChatGPT本质上只是起到连接作用的媒介，只不过这种媒介相比以往的媒介连接性更强，它不仅能依据自身强大的算力进行信息的整合，还能根据提问者的语气进行自我表达的修正，这种对人类的“超模拟”反向延伸了人类，不断获得了更好的“连接能力”，赢得了嵌

入社会运转系统的机会，使得人们忘记了它作为媒介的本质属性，继而对它产生焦虑，即自己是不是终将会被媒介所代替。尽管 ChatGPT 开启了“人机共在”的新主体时代，其增长速度显现出新的摩尔效应，但它也离不开人类文化大数据对它的喂养。因此，它发展的最大可能也只是成为与人类一起探索世界奥妙的“共在式主体”（co-subject）而已。

五、“反馈—关联”机制：六个向度协同运作

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移植到传媒教育过程中，能够一层层剥开传媒教育的表象看到本质，然后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指导传媒教育实践。这可以像用“5W+1H”，即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如何（How）报道一个新闻事件一样，也可以用图 2 中的六个向度描述与指导传媒教育过程。然而，正如在课堂里、书本里所学到的定理、公理只是以往或现状下最好的思想或科学知识的归纳总结一样，图 1 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也仅是一种归纳、一种总结。笔者认为将雅柯布森符指过程六因素移植于解释传媒教育过程是有效的，甚至可以推测一些在传媒教育中还未注意到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图 2 传媒教育过程的六个向度也只是认识传媒教育过程中的一个“中值点”，并不是终极结果。

前文主要对传媒教育过程中的六个向度分别做了分析。实际上，这六个向度，在传媒教育过程中，例如具体到某节课，它们之间是一种配合，是一种联动。在教学过程中的某一时刻，教师需要凸显某一向度，但这种偏向只是某时某刻的一种暂时需要，不是永久的。借用罗兰·巴特在《明室：摄影纵横谈》中的术语来说，这个向度就是一个“刺点”^{[2]69-75}，否则我们的整个教学过程都将是“均质化”的了。笔者认为借用“刺点”来隐喻某一“向度”是合理的，传媒教育过程是一个“符号文本”，任何一个“向度”一旦落入符号文本的视域，这种借用便有了其合理性。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具有强大的语义分析能力，能够从纷纭复杂的文化表象背后探析其深层语义机制^[15]。

从符号文本观的视角看，传媒教育过程是一个符号文本。前文所分析的六个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构成传媒教育过程这个活态符号文本的六个要素。尽管在前文中笔者是逐个独立地分析与阐释它们，但它们之间却并非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还是强关联，非弱关联。“教育在本质上是沟通交往活动，具有鲜明的主体间性；更进一步说，教育是行动者主动与对方进行沟通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激活对方，而对方又能够反过来激活行动者的活动。”^[16]也就是说，教育过程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主动的、相向而为的行为方式。

笔者在图 2 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出一个图 3，即传媒教育过程中六个向度的

“反馈—关联”过程。然而，诚如前文所言，这里的图3也仅是对传媒教育认识过程中的另一个“中值点”，还存在着很大的研究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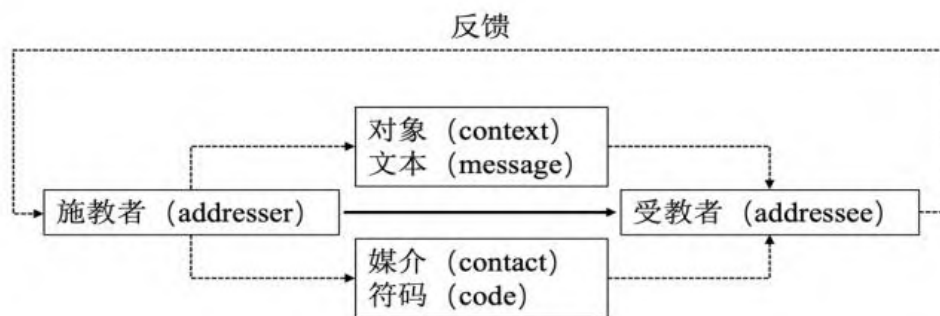


图3 传媒教育过程中六个向度的“反馈—关联”过程

在图3中，实线表示从施教者到受教者的教育过程，虚线表示从受教者到施教者的反馈过程。在授课过程中，施教者可以随时根据具体情况调控六个向度，以突出某个向度。在反馈过程中，施教者可以根据反馈情况，再次调控六个向度，以突出某个向度。整个过程是以“施教者”为中心还是以“受教者”为中心，并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通过调动这六个向度，使教育资源与教育过程能够最优适配，发挥最大效能。图3析出了传媒教育过程的六个向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机制，这对于传媒教育教学而言，具有像“操作指南”一样的指导性意义。让受教者将线上自主学习与翻转课堂进行最优适配，使二者结合起来会充分发挥混合教学的优势，因为“线上自主学习和翻转课堂互动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

笔者将雅柯布森符号指过程六因素用于解释传媒教育过程中的六个向度是一次符号学历险式创新。随着人们对传媒教育过程以及社会对传媒人才要求认识的加深，还可以提出比图3更为有效的模式，但目前图3指明了传媒教育过程中六个向度各自的意义与功能，对于创新与发展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佛朗索瓦·维克多·涂尚.教育符号学：教育中的符号与象征[M].崔琦恩，张日美，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3.
- [2] 罗兰·巴特.明室——摄影纵横谈[M].赵克非，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
- [3]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4] URBAN,G. Metasemiosis and metapragmatics[M].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2nd Ed. London.UK: Elsevier,Vol.8:88-91.
- [5] KARL B. Semiotic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Theory[M].trans. R.E. Innis,New York & London: Plenum Press,1982.
- [6] 罗曼·雅柯布森.语言学与诗学[G]//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69-184.

- [7] 皮特·特洛普.符号域: 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J].赵星植, 译.符号与传媒, 2013(1): 157-166.
- [8] 张淑萍.歌舞中的神话与历史: 以非遗“池哥昼”为例[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22: 36.
- [9]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7.
- [10] 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0.
- [11] 赵宪章.文学图像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190.
- [12] 赵毅衡.论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J].外国文学研究, 2014(2): 136-144.
- [13] UMBERTO E.A Theory of Semiotics[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7.
- [14] 唐小林.信息社会符号学[M].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45-55.
- [15] 祝东, 田小霞.比德观: 自然的文本化及伦理符号学意蕴[M].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51-56.
- [16] 刘旭东.论行动视域下的教育回归原点[J].教育研究, 2022(11): 66-76.
- [17] 冉建宇, 颜帮全, 张尚民.线上、线下学习特性对大学生翻转课堂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线上学习有用性感知和翻转课堂体验的中介效应[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21(6): 116-128.
- (责任编辑: 郑宗荣)

Six Orientations of Media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LIU Ligang¹ LI Jing²

(1.School of Chongq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2.Umberto Eco Institute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education is the process of semiotization of the educated. Media education includ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drama and film, etc. Based on the six elements of Jacobson's semiotic process theory, this paper peels away the surface of the media education process, and pinpoints the six orientations of the media education process in the sense of punctum, which can discuss many problems in media education more clearly and is the key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of media education. Analyzing the six orientations of media education process and their feedback correlation process can help to understand, promote and innovate the media talent training model.

Keywords:media education; cultivation model; semiotics; semiotization; studium; punctum; orientations